

# 北魏曹天度石塔考

□ 葛 钢 葛世民

曹天度石塔,北魏天安元年(466年)雕造于平城(今山西省大同市)。其时,正是开凿云冈石窟的时期,距今已有1540多年的历史。这座石塔是我国迄今有实体存在,记录着雕造地点、纪年和愿文的单体九级石塔,堪称国宝。石塔一波三折的遭遇,传奇般的经历,更是引人注目。

## 一、离奇的经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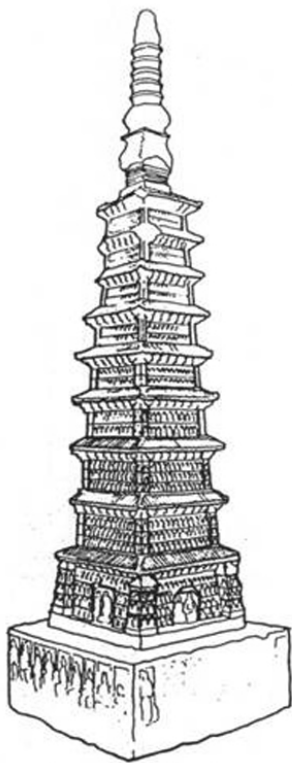
石塔雕造于平城,并在平城供奉。后来辗转到了大同市南110公里的原朔县(今朔州市朔城区)崇福寺,被供奉在弥陀殿内,成为崇福寺的镇寺之宝(图一)。

石塔现存高202.6厘米,为四角形仿木结构的楼阁式九层佛塔。石塔质材是大同地区出产的砂岩,与云冈石窟的石质相同。整座石塔由四部分组成:即塔座一块,塔身二块(其中一至七层一块,八、九层一块),塔刹一块,共四块掣垒成塔。其组成的结构是:下层塔块的顶部掏槽呈凹形,上层塔块的底部凿留突出的榫卯,呈倒凸形。使四块塔石叠垒坚固,如同一块完整的石料雕凿而成,四段相连,浑然一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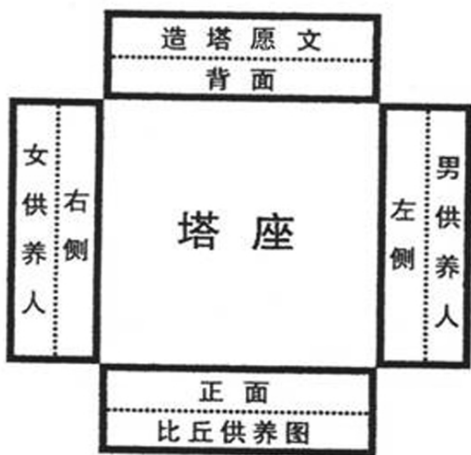
1937年9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山西省大同市。在此前后则派一些有关学者、专家“来大同,收集和鉴别城内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等信息资料,择机抢掠。其后又逐步扩展到大同市周围的各县。当得知崇福寺藏有“北魏曹天度石塔”后,于1939年派兵将寺院围起来,把这一国宝装箱运走。在装箱时,一位当地的爱国人士将塔刹藏匿(此人在1951年又将塔刹献给崇福寺)。日本人也不知这塔刹的去向,便将沉重的塔座和塔身(重约400多公斤)装

入木箱,运到兵营暂存,后又同其他抢掠的文物一并用火车运到天津码头,再装船运到日本国,安置在东京帝室博物馆。

1945年日本投降后,在联合国的监督下,于1950年3月至1951年4月,日本将一些公开抢掠的、又比较明显的或中国能提供出索要名单的历史文物和书画等,也有一些虽列入名单,但以战争毁坏为名,则未归还。前后分六批,共计105箱1497件运送到台湾。由台湾中央博物馆和图书馆联合管理处分批接管。不久,该石塔被台湾中央博物馆选出来



图一 曹天度石塔测绘图



图二 塔座图饰布局图

陈列展出。尽管该塔在台湾只有塔座和塔身(塔刹现仍保存在崇福寺内),但台湾中央博物馆仍然认为这是中国现存最早、独立单体雕刻最完整、最珍贵、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,而且对后世造塔影响深远,堪称稀世之宝,供人们一饱眼福。

1986年台湾在庆祝中央博物馆成立40周年时,特地从馆藏文物5万多件中进行了精选,选出40件最有价值、最具代表性的馆藏珍宝,进行展出。“北魏曹天度石塔”作为该馆首屈一指的国宝入选展出。专家学者和观众,对这1500多年前我们的先

人竟能雕造出如此精美的石塔无不称奇,更对先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,由衷赞叹不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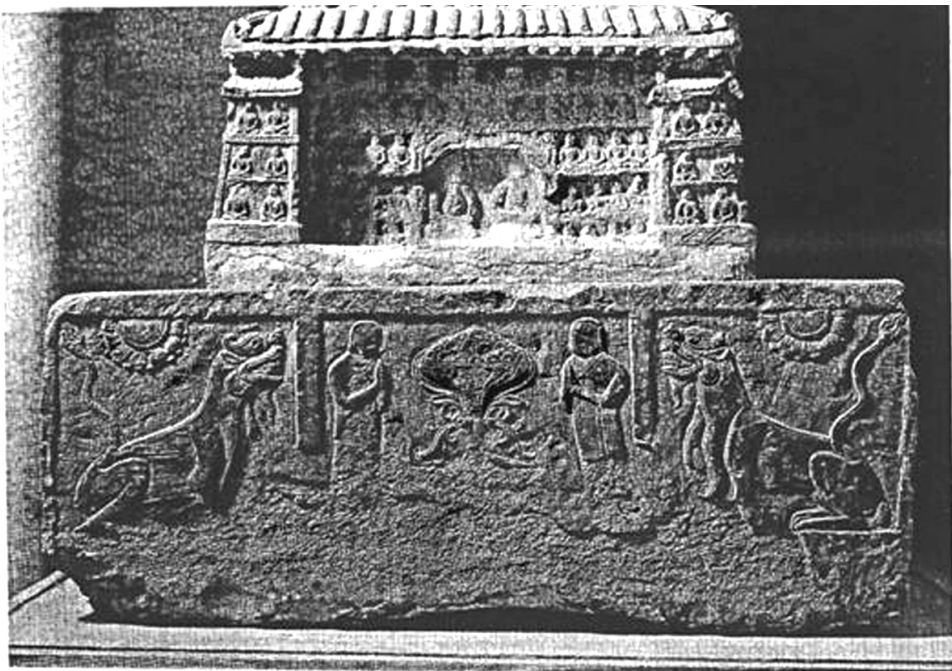
## 二、石塔图纹的雕饰

石塔的图纹雕凿有序,布局严谨,层次分明。所有佛像和人物等的造型雄浑古朴,比例得当,自然生动。雕像不论大小皆精雕细刻,刀法圆润,线条流畅。本塔虽为小型的独立石刻作品,但它同宏大的云冈石窟造像如出一辙。

### 1. 塔座

石塔的基座为正方形,高24.5厘米,长宽为63厘米。其正面是比丘供养图:正中间雕刻的是一个高蒂团莲供器,其上堆满了奉献的摩尼宝珠而呈圆尖形。其两侧是两个服侍的比丘,在两比丘的外侧是两只凶猛的护法狮子,在狮子下方各雕半个圆形的宝相花(图二)。

在塔座的左侧排列着9个男供养人,右侧排列着10个女供养人。塔座背面是愿文,愿文左右两侧的边上,还有男女供养人各一个,这背面的两个人,是左右两侧男女供养人队伍的延续。这两队供养人都面向前方(正面),双手合十,身体前躬,作朝拜状,极富动感,再现了当时的礼佛盛况。两队供养人分别是男10人和女11人不对称,有可能是依据曹氏家族男女的实际人数制作的。这些人可能是汉人,



图三 塔座与第一层

但他们同样都是时俗的打扮：男供养人头戴垂裙帽，上身穿窄袖紧袍，左衽，腰间紧束带子，下身穿褶裤，即所谓裤褶装，脚穿高筒长靴；女供养人头戴垂裙帽，帽顶中间下凹，上身穿夹领窄袖紧身上衣，下身穿曳地长裙。这些都与北方天冷，并便于在草原上骑射和放牧有关。这是典型的北朝胡人的打扮，而明显区别于南朝汉人宽袍大袖服饰（图三）。

塔座雕刻的这些香炉、比丘、护法狮子、宝相花、男女供养人等，都是为了供奉和朝拜佛塔第一层的佛祖、菩萨而设立的。把比丘安排在塔座的正面，左右两侧的男女供养人躬身合十，趋向比丘。这种安排与北魏尊崇佛教的浓厚气氛有关，佛教的教义规定：凡信奉佛教都要皈依三宝，即佛宝、法宝和僧宝。其中僧宝是指正式剃度出家的比丘和比丘尼（和尚与尼姑）。僧人是一切佛事活动的主导，平时则是对信教大众进行着教化，所以在许多供养图中，僧人一般是居主要或主导地位。这种排列形式，在云冈石窟中有多处体现：例如云冈石窟第19窟东侧耳室前壁左侧的二佛并坐龕的下部；第18窟明窗东侧中间的交脚弥勒龕的下部等，都是比丘供养在正面，左右两侧是男女供养人的排列布局。这与本



图四 塔刹

塔座画面制作形式的布局安排完全一致。这说明一个问题，即北魏不仅仅是尊崇佛教的气氛非常炽热，而且对从事佛教事务的僧人，也是特别敬仰的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对他们达到了奉若神明的程度。

## 2.塔身

塔身高128.6厘米，为正方形，底边每边长为42厘米，从下到上逐渐削减缩小，按垂直八度收缩。其形制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楼阁式建筑形式，共分为九层，仿木结构的斗拱承托着飞檐，飞檐上布满瓦垄，斗拱下是额枋，额枋由粗大的角柱承托，俨然是一座空中仙阁。每层又按三四排不等的设计雕刻佛像，共计有大佛像10尊，小佛像1332尊，均为浅浮雕。整座塔身设计严谨，布局规整，各种图饰比例协调，法像庄严，或坐、或立、或交脚，刀法圆润，线条流畅，确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。

塔身的第一层雕刻最为繁复，每一面的下部还雕有一个底座，座上四角有形如汉阙的大方柱，两方柱的正中间各雕有一个佛龕。在正面的佛龕里雕刻的是释迦牟尼和多宝佛的二佛并坐像，此龕在塔座比丘供养图供品的正上方。背面的佛龕内是一尊交脚弥勒佛，坐在狮子座上，两边各有一个胁侍菩萨。左右两侧的佛龕内，各雕有一佛二菩萨，佛为庄严坐像。在这四个佛龕的两边和上部，均刻满了小佛像，这些佛像分别按三、四排布局，每排小佛还设计雕刻了很多二佛并坐的图像。

在第二层至第九层的四面，按三、四层排列着密集、规整的禅定坐佛像或二佛并坐像，共计一千余尊，可谓名副其实的千佛塔。

## 3.塔刹

石塔顶部的塔刹，由刹座、覆钵、相轮和刹杆四部分组成。刹杆顶部有些缺损，现存的塔刹仍然高达49.5厘米（图四）。

刹座为四角形，由须弥山和佛龕两部分组成：即须弥山上是佛龕。须弥山重峦叠嶂，异于其他塔的刹座图饰，别致新颖。山上雕刻着仿木结构的仙阁，四角各有一尊坐佛，头顶着有瓦垄的屋檐，檐下每面是一个佛龕，龕内均雕刻着释迦牟尼和多宝佛的二佛并坐像。刹座佛像共计12尊。

刹座之上为圆形的覆钵，覆钵的底座为四边形，每边都雕刻有蕉叶的托盘，在圆形覆钵的四个方向上各雕刻一尊坐佛。覆钵之上是九层圆形相轮，相轮上方是刹杆，刹杆有些缺损。

## 4.二佛并坐像



纵观整个石塔所雕凿的图纹,其中最主要最独特的一个题材是二佛并坐图像。这种图像在云冈石窟的雕凿中也同样是一个重要题材,仅现存的就有多达385例之多。云冈石窟的这些二佛并坐图像的雕凿,只是早期的较少,而且设计的位置也不太显眼。到了中期和后期的石窟造像中,二佛并坐像则成了一个重要的题材,并且将这种造像放在了重要位置上。其中,最有代表性大型二佛并坐龕,如第7窟正面墙壁的下层,就设计开凿了一个高3.75米,宽4.5米的椭圆形大佛龕,里面的二佛并坐像异常精美而巨大。这与本石塔雕凿的二佛并坐像,风格一致,如出同一个工匠之手。

二佛并坐是依据《法华经·见宝塔品》所载:释迦牟尼在灵鹫山讲解《法华经》时,天空突然出现瑰丽夺目的多宝塔。释迦牟尼使用法力,用手一指,塔门顿开,只见多宝佛盘腿坐在塔内,赞叹释迦牟尼讲解得好。接着多宝佛让出半席,与释迦牟尼并坐论道。这一佛经故事,所显示的是西域佛教东渐,特别是随着凉州僧人大批涌入平城,在平城的佛事活动中,把鸠摩罗什在5世纪初所译《法华经》,当作一项主要讲诵内容,对平城的佛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同时,二佛并坐这种题材,也与北魏皇家的现实政治需要相吻合。这种历史的偶然机遇,则使这一佛经故事成为炙手可热的题材。

首先,北魏的佛教界开始将皇帝当作佛来参拜。据《魏书·释老志》载:“法果每言,太祖明睿好道,即是当今如来,沙门宜应礼敬,逐常致拜。谓人曰:‘能鸿道者人主也,我非拜天子,乃是礼拜佛耳。’”这时的北魏皇帝自然就成了佛教界所崇敬的佛。此后又有“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”。“诏有司为石

像,令如帝身”等等的举动。这些都说明,北魏的佛教也在或明或暗地为皇权服务,或受到皇权的左右。

再者,显祖拓跋弘生于兴光元年(454年),至和平六年(465年)即位当皇帝,只有12岁。据《魏书·皇后列传》记载:“丞相乙浑谋逆,显祖年十二,……太后密定大策,诛浑,遂临朝听政。”六年后显祖被五岁的儿子(孝文帝)取代皇位,满朝文武更是“事无巨细,一禀于太后”。直到太和十四年(490年)冯太后去世。这期间冯太后的影响、权力和地位,远高于两位小皇帝。北魏的朝野上下把她与皇帝并列在一起,颂之为“二圣”,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尊称。如《魏书》在李彪传、高间传、程骏传等篇章,就多次提到“二圣”:“今二圣躬行俭素,诏令殷勤。”“二圣清简风俗,孝慈是先。”“二圣钦明文思,道冠百代,……”等。这些都说明二佛并坐,实际上就是对“二圣”比肩的颂扬,彰显了冯太后和皇帝处于同等的或更重要的地位。

从以上两点就不难看出北魏的佛教界和朝野上下,都非常尊崇“二佛并坐”,其用意是明显的。特地把“二佛并坐”当作一个重要的题材,则成为当时一个很必然的事情了。

### 三、石塔的愿文

塔底座背面的愿文,为阴刻竖写19行,共126个字。字体是典型的早期魏碑体气质,字体苍劲有力,顿挫雄健,古朴庄重。由于年代久远,多次搬运,下部一些字迹模糊不清,个别字甚至已完全剥落。后经我国海峡两岸一些学者的辨认、断句和补字。这次过录时,对照拓片发现一些地方有误,又进行了补正。愿文全文如下(图五)



图五 愿文

## (一) 原文:

夫至宗凝寡弘之在 / 人圣不自运畅由表 / 感是以仰慕者愿莫 / 不如功务者因莫不 / 果乃感竭家珍造 / 石塔飭仪丽晖以 / 永或愿 / 圣主契齐乾𠂔  
 / 运表 / 皇太后皇太子 / 无穷 / 群僚百辟存亡宗 / 延沈楚炭有形未亥 / 菩提是获 / 天安元年岁次鹑 / 侣登蕤宾五日辛 / 内小曹天度为亡 / 颖宁亡息玄明於 / 平城造

## (二) 断句补注文:

夫至宗凝寂,弘之在人。圣不自运,畅由表感。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,功务者因莫不果。乃感竭家珍,造兹石塔,饰仪丽晖,以释永惑。愿圣主契齐乾坤,德隆运表;皇太后、皇太子享祚无穷;群僚百辟,存亡宗亲,延沉楚炭;有形未亥,菩提是获。天安元年,岁次鹑火,侣登蕤宾,五日辛卯,内小曹天度为亡父颖宁、亡息玄明於兹平城造。

铭文中有几个字简注如下:

“寡”是寂字的别体字;“弘”是“弘”字的别写字;“飭”是饰字的俗体字;或“通惑”;“𠂔”是坤字的古写字;“遼”通僚;“百辟”是指百官;“延沈”,沈通沉,引典:商纣王好酒色,喜淫乐,命乐师延作靡靡之乐,延只好违心从命。周灭纣后,乐师延内心愧对人民,便自沉濮水。喻内心煎熬;“楚炭”指楚人一炬,烧阿房宫成灰炭,喻遭劫难;“亥”是孩字的别写字;“鹑火”是星次名,即丙午年,为天安元年;“侣”通律;“蕤宾”古人律历相配,据吕氏春秋·季夏纪音律》古乐十二律,与历法十二月相配,五月为蕤宾之月,即农历五月;“内小”指内侍小臣。

愿文释译成现代话,其意概述如下:

佛教本身是庄严清净的,所以必须依靠人们之间的互相传播,才能使佛法得到弘扬。神圣佛法的真谛,它自己也不能径自深入人心,其真谛的深入人心,也必须由人们之间的宣扬、探讨而感知。信仰佛教的人只有达到了感知真谛的境界后,才会事如所愿,没有不如愿的事情。对于为佛教已经付诸了实际行动的人,他所下的功夫是不会白费的,一定会得到佛和菩萨的佑护。我认识到了这两点,就用尽我所有的家资,雕造成了这座石塔,并特地将石塔雕饰得华丽生辉,用这样的实际行动,来消除我多年的心中忧虑和困惑。并以此祝愿圣明的皇上福寿与天地同辉,福德隆盛而惠及国家的四面八方;愿皇太后、皇太子永享幸福;愿诸位同僚和百官们,

以及活着的和已经故去正在受苦的宗亲们、大人和孩子们都能得到佛和菩萨的保佑。天安元年五月五日,皇宫内侍曹天度为亡父颖宁、亡子玄明造于平城。

这篇愿文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:

天安元年(466年)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年号。皇太后即文成帝的皇后,献文帝时称皇太后,即文明太后冯氏。皇太子为献文帝与东宫李夫人所生的儿子拓跋宏。

献文帝生于兴光元年(454年),和平六年五月(466年)即皇帝位,改元天安,时年12岁。其子拓跋宏生于皇兴元年农历八月(467年)。皇兴三年农历六月(469年),拓跋宏三岁时被立为皇太子,仅在皇兴三年至五年共当了两年零两个月的皇太子,五岁时(471年农历八月)即皇帝位,称孝文帝,改元延兴。

献文帝仅当了六年的皇帝,一直没有皇后,即使拓跋宏的生母,也一直是东宫夫人,后被封为贵人,在儿子被立为皇太子时,根据祖制,被立即赐死(怕母以子贵)。在承明元年(476年)才被儿子追封为思皇后。

从以上提到的人物和时间推断:圣主应是献文帝,皇太后为冯太后,皇太子应是拓跋宏。愿文中提到的天安元年时还没有皇太子,似有时间上的矛盾。但可以理解为:天安元年(466年)是石塔的开凿时间,历经三四年后雕刻完工,在刻立愿文时,拓跋宏已被立为皇太子。故此塔在完工后所刻制的愿文,应在皇兴三年(469年),最晚也当在皇兴五年秋八月前(471年)。此时,也正是云冈石窟开凿的时期。

(本文图一引自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1984年第二版;图四、图五采自张畅耕、殷宪先生《北魏前期的铭刻书迹》,刊于日本《金石书学》2006年第11期)

(葛钢,上海东方消防杂志社;  
葛世民,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)